



在影像的历史中跋涉

——写在 10 卷本《中国影像史》出版之际

文 韩丛耀

[摘要] 影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中国影像发展史做出完善的书写绝非易事，它的非常之难可以概括为“四难”，史料难得，史事难定，史论难立，史观难建。史料，史事，史论，史观，这是该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愿望是好的，但实际取得的效果比设想的目标仍有很大的一段距离。搜寻全面的影像史料，尊重确凿的影像史事，建构科学的影像史论，形成正确的影像史观，这是我们从此一直要努力的目标。

[关键词] 影像文化 《中国影像史》

10 卷本《中国影像史》（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终于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面世，作为主编，几年间甘苦自知，个中滋味难以言表，然闻觉散发油墨味的书香，总觉得还有些话说。我们知道，影像的书写是瞬间的，影像史的书写却是漫长的，充满着曲折、艰辛与无奈。中国如此，世界亦如此。

一、影像记录见证着中国的发展 它的历史担当独一无二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最近国人都在谈论中国梦，其基本共识是，要实现中国梦，就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对历史有清醒的认识，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实现中国梦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符合中国文化精神。无论从传统还是现实角度，将中国梦与影像史相结合起来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影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影像记录着中国，也见证着中国的发展。一部影像记

录史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史，“中国梦”的见证史，中国人民走向幸福的当代史。将中国梦与中国影像的发展结合起来研究是自然而然的事。

从中国多灾多难的近现代史而言，一部被影像记录的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大型的中国之梦影像史诗，它让国人在温梦中惊醒，在噩梦中挣扎，在醒梦中自立，在拾梦中探索，在现实中筑梦。中国梦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自强后的一种燃醒。正因中国百年的切肤之痛，中国人提出中国梦的实现一定要走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道路。

从中国当前现实出发，影像的大众文化特性是凝聚各方力量实现中国梦的有效手段之一。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能得到 13 亿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主要因为它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等变成人民听得懂的语言、摸得着的未来。在影像信息化时代，影像学者不能再高深的语言说话，艺术家不能再用泛艺术的手段糊弄人，人民需要最通俗、朴实的语言来憧憬未来。影像史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这个民族曾经走过的道路、曾经经历过的辛酸苦

难、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和西方帝国列强任意蹂躏的屈辱。

由此而言，影像的历史担当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都是摄影的后来者，对影像史既充满着时间距离，又充满着空间距离，许多原本亲切的地方让今人反而感到了陌生。原本应该大书特书的地方，只是一笔带过。影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实际上，它的历史可以包括与它同行的一切既有。也许正如欧洲杰出文化历史学者布克哈特所说，距离给予史家一个更高的位置，可以从杂乱中感受到和谐，因而获取对历史力量和精神的整体把握。

虽然我们已经很熟悉意大利文艺批评家、历史学者克罗齐的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无数次地聆听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教诲，但我们仍然想寻找书写影像史的文化架构，一个属于影像自身历史的文化架构，并试图去确定文化架构的核心。如我国学者杨念群先生所说，每个文化架构都有一个神圣的核心，这个神圣的核心有助于社会和政治的定位，使得社会成员认清自身的地位，它由此成为文化、社会和政治汇聚的所在地。这种努力只是不想让影像史“沦落到只能向宏伟学术工程提供建筑材料的供应商的可悲地步”，而是“应该自己将被其视为将建筑材料的历史‘碎片’组合成在普遍联系中具有明确位置的完整的学术大厦”（杨天宏语），架构属于影像自身发展历史的学术大厦才是影像历史学家该做的事情。

当然，历史的书写不应将一切研究对象等量齐观，我们都知道历史书写不过是作者的一种选择性记忆，这种记忆的强度又取决于历史材料阅读刺激的大小和留在心里痕迹的深浅。影像史的书写更是这样，自始至终都充满着作者个人叙事张力与事实客观轨迹的矛盾。本着尊重历史、尊重影像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

二、中国影像发展史书写的难点： 史料、史事、史论、史观

西班牙科学家塞韦·奥乔亚在上个世纪曾经说过：科学的进步及其非凡的成就，是我们这个世纪

最大的特色。在这样一个科学进步的世纪里，有两样进步，不但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同时对人类的道德及社会的政治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那就是摄影术的广泛运用及计算机的发明和使用。华特·本雅明在20世纪初就曾断言：将来的文盲是不懂得摄影的人，不是不会书写的人。可见摄影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显得多么的重要，但对人类社会进程显得这么重要的一项事业其自身的发展史却没有被很好地书写出来，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史学积淀深厚的文化国度里，影像发展史的研究和书写反而显得非常之薄弱。

但是，想对中国影像发展史做出完善（哪怕是完整）的书写也绝非易事。

一是史料难得。中国影像史料的搜集非常之难，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貌似哪儿都有，实则连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资料室都难以查到可资使用的史料。即使查到了一点，想复制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些史料已经成为一些公共事业机构的“私有”财产了。查找中国影像发展历程的史料耗用了我们的大部分时间，其中的艰辛和无奈非“个中人”不能体味到“个中滋味”。再说，就是为了搜集基本的写作资料，我们动用的人力已经超出百人，耗时两年多，这也只是对中国影像发展历史的材料梳理了一点点，相信更多的影像史料还躺在文献故纸堆中，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掌控在个人及国内外有关机构的手上。

二是史事难定。许多影像的基本信息缺失，实际上与其说是缺失，不如说是中国影像文化的天性使然——重“写”意，而轻“写”实，重“艺术”而轻“纪实”。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基本信息，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这是当时的原始信息文本还是后来再构建的信息文本，等等。对材料的梳理、考证很是难为了我们，其他学科多少代人持之以恒地接力研究走到了今天，已经有了可观的基础，已经有了系统性的史料和公认的史事，而影像史的研究却才刚刚起步。我们面对这样薄弱的基础所开展的影像史研究，其茫然与曲折是可想而知的，窘迫使我们几度停滞不前。我们也知道中国影像史事的梳理需要一些时日，可我们的写作是需



要在一定的时间段完成的,所以许多史实的呈现显得仓促、还不够严谨,时间允许的话应该进一步地斟酌再斟酌。

三是史论难立。摄影界对于影像历史书写方法的批评之声一直不绝于耳,尤其是摄影家、理论家、批评家的声音很不一致,意见有时又是针锋相对的,令我们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听什么样的意见,有时甚至分不清到底什么样的意见是对的。再者就是意见多建议少,尤其是对于影像史的书写工作有正能量的建议比较少。也正因为批评的不确定性,让我们很难及时的改正,如有的批评是针对史料的,有的批评是针对影像史写作的,有的批评是针对影像史的未来模样的,甚至有的批评是针对作者个人的。我们虽然也拿出了中国影像史写作的基本要求甚至给出了“写作模版”以供撰写各卷本作者参考,还集中一段时间对各卷作者进行培训,但由于每位作者的理解度不一样,做史学研究的能力和不同,呈现的研究文本还是很不一致。有的仅仅停留在史料的梳理、史实的自然呈现上,没有在图像史学理论的指导下,通过精细的研读史料,多方考据史事之后形成中国影像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架构。当然,这种“自然”的写史方式容易被人接受,但对于影像与社会的互动性的揭示来讲,显得多少有些无力,影像史料丰富性的内涵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挖掘,影像产制意义的场域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阐释。因此并未达到我们想要建立一套中国影像史学理论研究体系的构想。最后我们只好集各路方家之智慧结合自身的一点点努力,勉力而为之。幸好,这是原新闻出版总署的委托出版项目“中国影像历史”,是个命题作文,本着做研究课题的认真态度,负责地、认真地完成预设的研究文本和研究体量是我们必须选择的方法,或者说是我们必须完成这一“命题作文”的规定动作。因此,研究文本总体上的摇摆度不大,但是距离建构中国影像历史的宏观理论体系框架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四是史观难建。虽然我们始终有一个谦虚的心态,写作上仍然是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当然不是我们本性如此之好,是因为我们深知影像史书写的艰难,我们所做的工作和该做的工作比起来真是“八

字还没有一撇”,连抛砖引玉都谈不上,充其量也就是个“草船借箭”,我们现在呈现的文本是“借箭”的“草船”,各位摄影家、理论家,各路方家智者,请将你们的批评和建议射过来,我们将认真地分析整理、消化和吸收,再一点点的修改我们的文本,修订再版,再版后再修订,直至达到一个多少能够使人感到基本满意的程度。这也可能是我们目前能够想到的一个又快又好的办法,即借用大家的智慧和力量,把中国影像史书写文本尽早地完善和丰满起来。我们的设想是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的有关部门建立长期使用的电子邮箱和联系电话,专门搜集中国影像史的资料和各路方家的批评建议。这个联系方式起码要保持10年,并且长年累月运行。10年时间不短,但也不长。20多年前中国的摄影家们、摄影界的领导们都呼吁加强中国摄影史的研究,最近几年甚至在全国性的会议上都开展了专门的研讨。研讨又研讨,呼吁再呼吁,但也只是“只听楼梯响,未见人下来”。所以说,我们现在就从头开始,扎扎实实地起步,做一些影像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为《中国影像史》的修改勘误提供真正有价值、有质量的史料,应该说,《中国影像史》首次出版之后才是我们对中国影像史研究的真正开始。给《中国影像史》10年的修改、补充和完善的时间,《中国影像史》一定会还你一个较为满意的容颜。

史料,史事,史论,史观,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天看来,我们的愿望是好的,但实际取得的效果比设想的目标仍有很大的一段距离。搜寻全面的影像史料,尊重确凿的影像史实,建构科学的影像史论,形成正确的影像史观,这是我们从此一直要努力的目标。

三、在探索影像发展的进程中 留下本应有的位置

摄影术发明初期,尼埃普斯和达盖尔对摄影术观念发生了分歧:一个认为通过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努力,一定能够完成像一件科学技术发明一样的、完善的摄影术;另一个则意识到仅一个研究团队甚至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研究力量都不足以完成摄影

术,而应该把手里掌握的、尚未成熟的摄影术公布于世,让世人无偿分享他们的成果,同时用全人类的智慧来完成它、完善它。后来的摄影发展的事实大家都知道了,在这个母体中还孕育出了电影和电视等视觉技术影像。所以,现在我们站在前人肩膀上的一点瞭望心得也要尽快地公布与分享。再者,影像史的书写对电影发展史进行观照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不是将研究下限设在1949年,电视发展史也是我们书写的內容。这样一项需要全人类的智慧来完成的事业,其发展史的书写也应该由大家一起来完成,既然历史选择了由我们执笔先来,作为主编,就不得不从心底发出真诚的感谢。

《中国影像史》能够面世,感谢是必需的。

首先要感谢的是为中国的影像事业——摄影事业、电影事业而开拓奋斗的先辈们!是你们书写了中国的影像历史,我们在这里使用了您留给我们的影像,由于种种(确实是各种各样我们能想到的和我们想不到的)原因,可能在署名和版权上有所疏忽甚或错误,请原谅这不是我们的故意,孩童都知道这是不应该的,一定是因为什么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造成的,希望这些先辈们的亲朋好友、曾经的领导或同事、师生和先辈的后人看到《中国影像史》的初版后,将文本的谬误之处及时告诉我们,我们真诚地致谢,尽快地勘误校正。还要感谢对中国影像历史做出研究的各位前辈、专家、学者和其他研究人员,我们一定引用和参阅了你们的许多研究成果,虽然有一一注明出处并有致谢之责,但疏漏和不当时有发生。如果我们对您的研究成果引用对了,那原本就是您的智慧,光荣永远属于您;如果引用错了,那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将承担全部过错。

其次要感谢的是原新闻出版总署的有关领导,是你们给了我们做中国影像历史研究的机会;感谢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领导,在你们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有很自由的学术研究空间,有对中国影像史深化研究和延展研究的可能;更要感谢的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各位领导和各个机构、单位,你们的

具体关心、精当指导和热情鼓励,激励着我们加快了研究的进程,你们帮助我们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让我们内心一直充满着温暖;尤为让我们感念的是那些具体地帮助我们查找资料和直接提供资料的人士,是您的百查不厌、百问必答和不厌其烦地协助我们搜集查找资料,才让我们有了今天这样的文本。另外要特别感谢那些无私的、长时间地为中国影像史的书写查找和搜寻资料的各位人士,才使得我们有了写作的可能。

中国的影像事业发展之路有它自身的轨迹,除了在“摄影术”诞生之后与世界几乎同步的技术技能外,中国人在探索机械成像、光学成像方面有着自己辉煌的历史和鲜明的足迹,因此在书写中国影像史的时候,我们不能数经忘典、崇洋贬中,我们要给中国人在探索影像发展的进程中留下本应有的位置,公平公正地对待一切为了影像进行探索的人们,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是现代人是古代人,任何一种厚此薄彼的书写其实质都是对历史的真正伤害。影像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它将使得整个世界都是它的永久遗产。

摄影术的发明是有明确的时间记录的,而对摄影(“摄”与“影”)的探索谁能断言是始于何时?人类对影像尤其是对影像技术的研究探索远不是几个人就能定论的,它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几代人的不懈探索,逐渐积累,逐步完善。

傅雷先生说过:“世唯有学殖湛深之士方能知学问之无穷而常惴惴默默,惧一言之失有损乎学术尊严,亦唯有此惴惴默默之辈,方能孜孜矻矻,树百年之基。”我们都深知自己不是“学殖湛深之士”,亦未能“孜孜矻矻,树百年之基”,但在《中国影像史》的书写过程中的的确是“常惴惴默默”,惧怕“有损乎学术尊严”的“一言之失”。

相对于《中国影像史》这样宏大的文化建设工程,编著者的力量显得非常渺小,研究能力多有不足,错误和不当之处就难免了,因此,我们殷切地期待各路方家的批评与指正。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